

宗白華評傳

劉海粟題



(下)

邹士方 著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邹士方 著

宗白华评传

(下)

劉海粟題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白华评传 / 邹士方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51-0308-2

I. ①宗… II. ①邹… III. ①宗白华(1897~1986)
—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829 号

宗白华评传

作 者 邹士方
责任编辑 蒋炎兰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政编码 100013
电 话 52470796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434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308-2
定 价 58.00元(上下册)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十章 重庆时期

地球是天堂中的地狱么？
它只是蓝空的一颗小星，
我们拆开了心中的铁槛，
就看见了它是人间的天堂。

* * *

窗外的落日，
在半天的浓雨里，
映出长虹七色。
绝代的天才，
从人生愁云中，
织成万古诗歌。

一 会见毛泽东

1937年7月南京沦陷，宗白华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一直到1946年底才又回到南京。

重庆时期宗白华除在中大哲学系任教外，还主编了《时事新报·星期学灯》（渝版）达8年之久（下章详细介绍）。另外他还与商承祚、梁思成、常任侠等组织了中国艺术史学会。1941年2月与洪兰友、谢冰心共同编辑《文艺月刊》，为该刊编委。

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会见少年中国学会在渝的会员，宗白华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周恩来风趣地对宗白华和毛泽东说：你们是一个组织的，都是“少中”会员，我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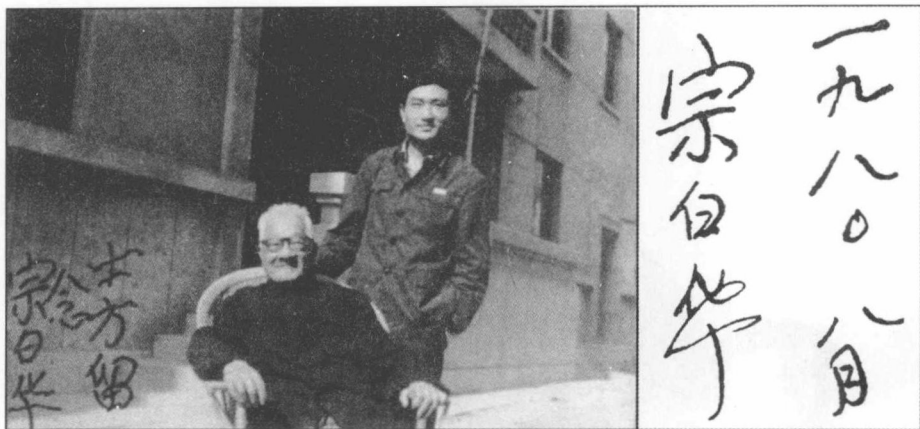
据于民（北大哲学系美学副教授）对笔者回忆，宗白华曾对他讲过：那次会见在重庆红岩，王若飞亦在座。黄仲苏还给大家拍了合影像（1981年9月26日）。谢随知（原中央大学哲学系学生、时为苏州大学副教授）为笔者提供的材料（1982年1月12日）中也谈到这一会见：“我知道宗老师跟毛主席早年曾经同在一个少年中国学会里头相识。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庆来谈判期间，曾经约了许多旧相知请客，宴叙，中间也约了宗白华老师、方东美老师和潘菽老师等人。之后第二天，我曾问起宗老师关于毛主席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倒还记得我，拍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现在《流云小诗》还写不写？我就笑笑说，早已不写了。’宗老师那时还曾说，毛主席好像心境有些沉闷，似乎受了国民党的压抑。”

二 教学和社会活动——朋友和学生们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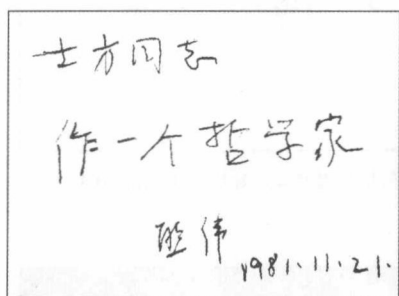
宗白华在重庆的教学和社会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参阅他的朋友和学生等为笔者提供的回忆材料：

苗力田（原中央大学哲学系学生，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说：“我1939年至1943年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上学，与胡小石的儿子同学。当时宗白华为系主任。1942年以后改为轮流做系主任。方东美教《西哲史》，李证刚教《中哲史》，何兆清教《逻辑》，唐君毅教《中哲史》（1941年以后）。我毕业后做了陈康的研究生，陈后来去了美国。”（苗力田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1年11月20日）

熊伟（原中央大学哲学系教师，时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说：“重庆时宗先生开了《形而上学》和《美学》两门必修课，以及《叔本华》、《尼采》的专题课。当时哲学系只有13个学生。哲学系属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大有七个院），院长楼光来，是研究莎士比亚的（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文学院除哲学系外，尚有外文系，主任范存忠，徐仲年在系里教法语。还有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徐悲鸿为艺术系主任，教员有张大千、吕斯百、傅抱石等。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宗先生对我们讲到润之如何如何，一直对毛有感情。宗先生讲《尼采》《叔本华》，让学生看外文原书，他讲课是漫谈性的，意境很高，他指定学生看书听课，学习终了作篇文章。我1933年留德，1941年回国。哲学系20年代系主任是汤用彤，30年代汤用彤去北大，宗先生自30至40年任系主任，40年代起系主任采取了轮流制。”



宗白华与邹士方合影于宗寓前(1980年8月)和邹士方为他拍摄的照片背面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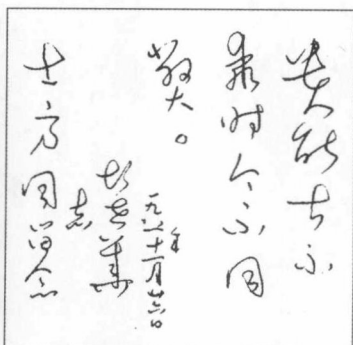
著名哲学家熊伟题词(1981年11月)



左起:许德珩、宗白华、钱昌照、沈性元、朱穆之合影于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开幕式上(邹士方摄 1983年1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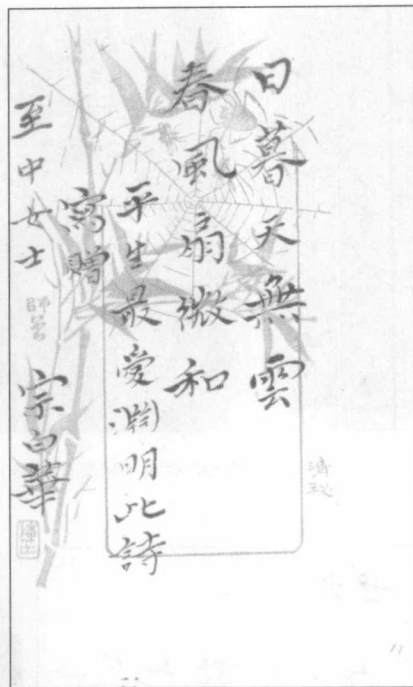
左起:许德珩、宗白华、钱昌照合影于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开幕式上(邹士方摄 1983年1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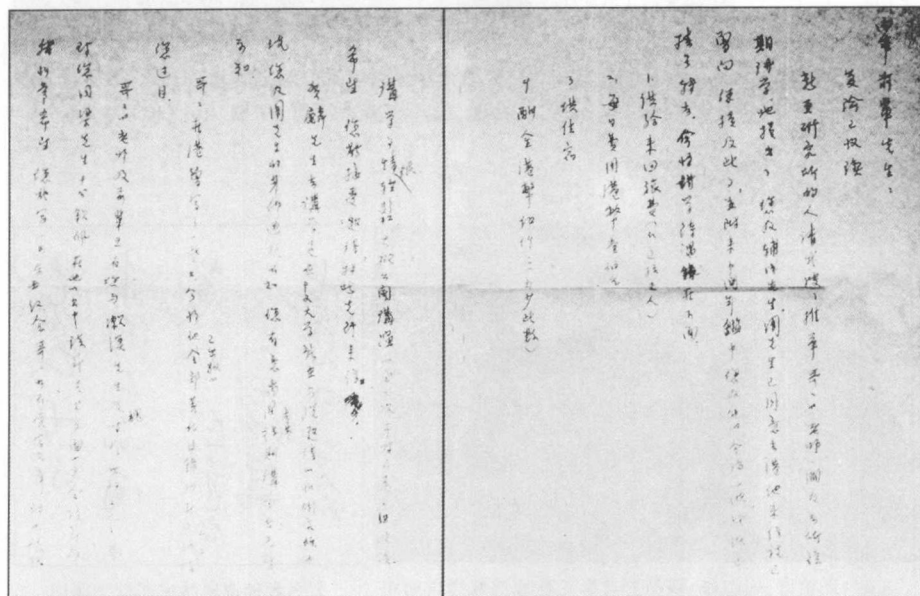
著名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题词 (1981年11月)



邹士方访问虞愚(右)(1987年5月8日)



宗白華為唐君毅之妹唐至中題詩(1944年)



唐至中致宗白華书信(1980年)

熊伟还谈了对宗的印象：“宗先生一生很可爱，陶渊明风格是他一生特点。有些人觉得他讨厌，他很洒脱，从不计较。他也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态度。他从尼采、叔本华的哲学到美学，都是个人在那儿欣赏，对中西艺术全神贯注地欣赏。他有哲学家的味儿，他沉醉在那里欣赏，觉得人生有这样一些美的东西就很满足，很美。至于身外之物，他看得很轻。这是凡夫俗子做不到的。他做学问也是这样，对于中西美学，他从理论上和物象上都很重视，一直是以美学家、哲学家的心情出现的。他一生不争利禄，也不在那儿骂人，很淡泊洒脱。尘世一些事他也参与，但看得很轻。在重庆，郭沫若忙得很，宗白华又是陶渊明，他的风格使他不可能总去找郭沫若。旧社会许多坏的作风他都没有，文人相轻他没有。他与世无争，从不打击人。他自己自得其乐，别人对他好坏无所谓。”（熊伟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1年11月）

胡世华（原中央大学哲学系教师，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是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胡惟德的儿子。胡惟德也是一位书法家和考古学家。胡世华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对书法和音乐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胡世华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校时同邓以蛰过从甚密，经常到邓的家中欣赏古字画。邓以蛰在北大、清华两校教美学。1936年至1941年胡世华留德，回国后到中山大学数学系教书。他回忆说：

我1943年至1946年受宗白华先生的邀请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系主任为方东美。我1946年后去北大。1951年到科学院。

在重庆时，宗先生同李证刚先生住在一起。他似乎没有政治倾向，与世无争。对国民党从不说颂扬话，有一次蒋介石到中央大学，大家都去看，他不去，说：“这有什么看头。”但他不发表反蒋言论。那时我经常向他请教有关音乐和书法的美学问题，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中国书法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很像音乐中的纯音乐。”宗先生说：“是的。”我同他谈肖邦、莫扎特，发现他们对他们的作品和生平事迹都很熟悉，并有深刻的见解。当时我很喜欢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我认为这表现了个人的情感，有磅礴的气势。我不喜欢一般的交响乐，觉得它们没有突出个人的情感，而单独的钢琴独奏由于没有烘托，又显得单调。宗先生似乎很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巴赫的曲子重复太多，他笑了笑回答我说：“中正和平嘛。”（胡世华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1年11月）

甘霖（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副教授）回忆说：“1945年初，宗先生在



宗白华评传

重庆中大礼堂讲康德美学思想，中大礼堂原是做礼拜的教堂，屋顶很高，给人压抑之感。我当时旁听，听讲有二三百人之多。”（甘霖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22日）

杨咏祁（原中大学生，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回忆说：“在1945年或1946年，宗先生在重庆沙坪坝（当时校址）作‘歌德’学术报告，孙跃楣同学曾将演讲整理，并于《心与像》墙报上发表。”（录自杨咏祁复笔者的信，1982年9月14日）

吴冠中（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回忆说：“抗战时我任重庆大学建筑系助教，没有什么课，就到中央大学听课，主要是听法文课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课。我整整听了四年，对宗先生印象很深，他一派名士风度，戴顶草帽，两条带垂下肩来，十分潇洒。记得他讲过：画框就像戏剧的舞台，没有画框的画如同彩排的戏剧，还不是正式演出。有一次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外国名画画册被人撕掉许多张，大为愤怒，就写了许多话去批评此事。”（吴冠中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7年8月25日）

吴梅先生的弟子唐圭璋回忆宗先生：

抗战期间，在重庆沙坪坝是中大同事，他在哲学系，我在中文系，由于汪辟疆、胡小石先生都在中文系，由此我们接近时间多。我以为他为人胸襟开拓，爱好大自然，也爱好歌咏大自然的名著，他教美学，大概融通古今中外的名著，和各个文艺领域的美学理论，书法、画事、雕塑、古典诗文词，吸收前人的精华，为美学树立了宽广的道路，利人利己，对精神文明起了默化潜移的作用。他自己树立光辉的榜样，从不见他对人疾言厉色，从不见他自己抑郁寡欢，落落难合。他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天真朴素，心无城府，是否可以说，他心如“光风霁月”吧！或者说，他是“豁达大度”吧！那时他们哲学系有的老师目空一切，火冒三丈，动辄骂人，忘记循循善诱，忘记言传身教，和宗先生正是鲜明的对比。因此，无论我们同事，我们同学，无不敬之爱之，至今不忘。在那时他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和他力求纵通横亘的丰富知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录自唐圭璋复笔者的信，1982年4月11日）

范存忠回忆说：

抗战时，中央大学迁在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附近），白华奉其老母住柏溪对岸的杨家塘，与沙坪坝俱在嘉陵江畔，相距二十多里。但下水易，而上水则靠拉纤，或坐滑竿。一天白华回家时，写过一首小诗，传达“中

国心灵的宇宙情调”，原诗如下，当时传诵，认为罕见：

柏溪夏晚归棹

飙风天际来，绿玉群峰暝。云罅漏夕晖，光写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淡淡孤霞回。系揽月华生，万象浴清影。

（录自范存忠复笔者的信，1982年5月6日）

袁鸿寿在他的《追念宗白华先生》（刊《人民政协报》1987年2月10日）一文中写道：

我在北京对于两位前辈有“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的印象，一位是林宰平先生，一位是宗白华先生，其丰度气象，高山仰止。惜乎林先生只在张难先前辈席上见过一面，而宗先生是我在前中央大学念书时的老师，有过几度接触。

一次是抗日战争中，我在宗先生客房，见壁上悬有四小屏条，内容是苏曼殊重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该译与玄奘所译有三处不同，一是改题目为“归命一切智”，二是改音译咒为义译咒“往哉往哉，彼岸哉，往彼岸之觉哉”，三是比玄奘译多了一句。苏云对照原文，奘师漏译一句。此译不见于柳亚子所编《苏曼殊全集》。因问宗老，该译从何而来？先生云从陈独秀处得来。这一件小事却在我心上留了印象，一是宗老师与陈独秀交情不浅，二是宗老对哲学体会之卓，三是在重庆敌机狂轰滥炸之际，内心宁静，如统帅之指挥若定。

虞愚（中国哲学史和佛学专家、书法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回忆说：“宗先生同马一浮关系很深，抗战时他介绍我到马一浮办的‘复性书院’学习，我因故没去。当时我任于右任的监察院长的办公室主任。”（虞愚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7年5月8日）

徐仲年回忆说：“重庆举行过二十万人的反法西斯大游行，宗老和我并肩而行。游行的结局乃是著名的较场口事件。”（录自徐仲年复笔者的亲笔信，1981年11月25日）

唐君毅的妹妹唐至中回忆说：

哥哥在1944年、1945年住在中大柏树林柏树村教授宿舍，宗先生住在斜对面，我与母兄同住。我当时在中大教育心理学部办的实验中学任教，哥哥要我去中大旁听宗先生讲美学，我听过多次。我对哲学本是外行，加以相隔时间太久，他讲些什么，我早已忘掉了。但是他的飘然的风度，对



我却是印象很深。我读过《世说新语》，我总觉得他颇有魏晋人超然而物外的味道，对现实的名利得失都似乎不在其胸臆。我同他并无来往，我总觉得他平时很超脱，可是对于人总是非常和蔼的。（录自唐至中致笔者的信，1982年10月17日）

唐至中的另一段回忆：

宗先生抗战中在中大时，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宗先生常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过膝盖不多的短小蓝布长袍。住房是在水田建筑的，夏天雨后室内也会滑跤的。抗战8年，宗师母连重庆城也未去过。生活之艰苦可知了。当时哥哥因妹妹弟弟逐渐长大，他的责任越来越轻；而宗先生的两个世妹、一个世弟逐渐长大。大、二似在读初中，小弟弟当时是小学生。宗先生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好在他们从江南带了一个夏妈（或谢妈）操持家务，宗师母的身体不好，得以减却不少家务劳动。宗先生总是那样自然、怡静、悠然自得，不以得失萦怀。哥哥常常说，宗先生真像六朝时的人，我读《世说新语》也觉得他是上书德行、雅量二类人物。他又像陶渊明之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真是一个有道之士。他有时又有些像庄子，但不是以天下的沉浊不可语之庄子，而是有庄子之超脱，游心物外，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傲睨于万物。（录自唐至中复笔者的信，1987年8月23日）

谢随知1982年1月29日在致笔者的信中回忆说：

我是1938年在重庆进中央大学哲学系学习的，胜利以后，回到南京，至1946年夏离开中央大学为止，这一段时间，和宗老师不时接触，听他讲课，向他问道。我是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毕业的，中间离开过一段时间……

记得宗老师在重庆时，先住在沙坪坝中大附近简陋的教授宿舍里，后来因避日本飞机轰炸，迁住到一个叫柏溪的僻乡，当时在那里设有中大分校。每周要到沙坪坝来上课时，他就坐民船来沙坪坝，手提一个包包，包着一个陶器罐头，里面装的是米饭，上盖一点蔬菜和荤菜。上完了课，就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吃饭，当天回柏溪去，有一段时间，他就是这样过的。

宗老师住在沙坪坝的时期，我和他接触比较多，问过他许多问题，主要是哲学的，文学和艺术的，有时候也涉及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据我所知，宗老师跟政界的人是没有来往的。不但我没有发觉，

而且可以保证，除了文学院的同事，如胡小石、李长之等人，经常闲谈之外，没有多少人跟他往来。只见过一次，郭沫若和田汉远道来访问过他……

他常常慨叹中国人民，中国这个民族灾难很深重，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很痛苦，这是许许多多因素造成的。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当时看不出什么光明的前途来。他也觉得国民党是腐败，共产党当时在北方，究竟搞得怎么样，他不知道，但认为一切要决定于世界的大局。决定于当时世界大战的结局怎么样，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那时的生活很艰苦朴素，真是布衣粗食。然而有两次募捐抗日战争的捐款，他在同事中是捐得特别多的。

我觉得，宗老师的灵魂深处，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很深沉的，怀着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个也许可以追溯到他在德国的时候，或者就种下了根子。叔本华、歌德、尼采、倭伊铿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很大。宗老师在中大曾先后开了介绍这些人的思想的课，详尽地介绍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从我的观察可以说，歌德和叔本华两个人是宗老师最喜欢的，其次就是尼采。

记得当时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近于中国佛家小乘，宗老师对佛学怎么看法”宗老师认为，佛学许多名相上的分析，繁琐的论证，证到后来只是一个空；既然毕竟是空，那么还弄那么多繁琐的名相分析去纠缠做什么呢？经他这样一说，我倒也觉得很爽快。读一部《大藏经》要费不少心血，归根到底不过是证明一个空，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抗战胜利后，我到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参观过，看见那么多的佛经，就觉得要从这里找出一个人生的归宿来，实在是很茫然。但是宗老师认为，叔本华的思想，符合人类的实际，也符合整个生物界的实际，那就是由于一种盲目的求生意志，才表现出这个生态的万千世界来。究竟为了什么？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只可以说是一种无名的力。自有人类以来，战争就连绵不断；从生物史来看，也是互相竞争，弱肉强食，没有什么道义可讲。那时，我自己经常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往哪里去？或者世界往哪里去？究竟怎样呢？也许是当时的时代，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把人类的文明不当一回事。在宗老师看起来，这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实质上支配着这些政治上的人物，有什么道理好讲呢？世界就是被各种力量的冲突支配着。中国当时受到日本的封建



宗白华评传

的野蛮的皇军的压力，一些知识分子，从南京、北京等地，逃到很狭窄的内地去，困苦颠连；再看看国内，国民党的统治是那样的腐败，因此，许多善良的敏感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形成一种阴暗的心理，恰恰可以用叔本华的盲目的求生意志，以及一种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发挥权力意志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的一切。但是宗老师强调，发挥权力意志，还不是尼采哲学的终极目的，尼采的理想是超人。宗老师说，世界既然是一团烦恼，怎样解脱它呢？歌德活到70多岁！叔本华也活到70岁以上，叔本华悲观的哲学并没有使他自尽，那就是因为探求真理，或对艺术的追求和创造，可以解脱这种烦恼，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充实，是人生唯一的寄托。宗老师并不信宗教，但他可以说是钦佩一切真正的道德家、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

我比较浅薄，当时自己觉得还不能全面地了解宗老师涉猎的范围和内心深处的爱憎。我从课堂上听他介绍的，除了德国哲学史上一些大哲学家的思想以外，也很欣赏他对古代的思想家所作的一种艺术的概括。例如 Plato（柏拉图）与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的分别，可以说 Plato 是一手指天，Aristotle 是一手指地。他介绍 Spranger 的价值哲学，认为人的精神的发展，像一个六面体，人的精神往往分向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学术（理性）、艺术（美）、宗教（道德）和社会（爱）六个方面发展，可以把这种范型来分析任何人的精神活动的倾向。宗老师是相信这种学说的，他也是赞美 Kant（康德），包括 Kant 的形而上学和美学，他也曾经赞赏过 Spengler 一本名著《The Decline of The West》（西方之衰落），认为它分析入微，令人折服。宗老师对于 Marx（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说过：“从分析商品和交换开始，一直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解剖得那么深刻，是一本了不起的杰作。”

宗老师认为，中西哲学之比较研究，大有文章可做。尼采的思想类似老聃。中国从孟子到宋代陆、王，他认为比程、朱的理学要直截简易，高出一截。他认为，在文化上应该雍容博大，吸收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从事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再创造。

宗老师的气质，比较不好细致繁琐的逻辑分析，而偏爱于空灵的、纯洁的、内容丰富的形象和精神美的探索 and 追求，这包括从绘画、音乐、雕刻到诗和文学。他也赞赏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大师，几乎每次都是拿崇拜的口吻谈到他们。但也不忘情于中国古代的任何一幅壁画、碑刻或雕

塑。我记得，曾在南京四牌楼丁家桥宗老师寓所中，看到他的书室里供着一个石头雕的人头像。宗老师说：“这是中央大学从南京仓皇撤退时埋在土里，抗战胜利，复员以后又重新挖掘出来的。”他接着说：“我回家来，只要一看到它，什么烦恼都消散了。”那的确是一尊雕刻得很细致精美、表现着开阔、明朗、宽厚而又洒脱的人头像，至少是一千年以前的作品，尺寸恰似成人的头颅那么大。

宗老师曾经不止一次引一句名言以概括比喻一个人的风格或文化精神，就是说 Appollo（太阳神）代表着清明的毫不含糊的理性，洞察一切的鉴别力量；Dionysius（酒神）代表着热烈的、陶醉的、奔放的诗的炽情。在那时候，内忧外患交织，外敌的凶顽，加之内政的昏庸腐败，宗老师看不到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光明道路，独钟情于魏晋六朝的那些现实上困苦局促、精神上洒脱不羁的所谓性灵人物，认为他们不论言谈风度、人品文章，都是能够摆脱世俗的污浊，精神上一往情深、有高超的心灵寄托的一群风流蕴藉的人物，尽管有的愤世嫉俗，不甘同流合污（如阮籍），有的恢宏气度，能够从戎主政（如谢安等）。在历史观上，他是崇拜英雄人物，能拨乱反正，开创出一个新时代来。就是对拿破仑，宗老师也对他的《法典》推崇备至。

这就是35年前宗老师留给我的一个粗略印象。总的来说，宗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醇厚、贤明的学者，也是一个深情敏感的诗人哲学家，像所有人物都受他的时代环境、学养和家庭出身的局限一样，40年代的宗老师当然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我觉得，他那种内在的、贤明的（他是真正做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包含一切的智慧和气度，使真正了解他的人可以从他那里感受到一种对于真善美追求的不息的热情，对于无谓的欲望的鄙弃和解脱，因而归于恬淡和率真。在此同时，他深藏内心的，对于人类的虚伪、卑污、愚昧和粗浊的贪欲，造成人间莫名的阴暗和混乱，则不时流露出深沉的谴责和愤慨。

宗涛（宗白华之独生子）回忆说：“重庆时，李长之常来我家，他小矮个儿，却名叫长之（长子），我们小孩对他记忆很深。”（宗涛与笔者的谈话记录，1981年10月16日）

抗战时宗白华在主编《时事新报·星期学灯》（渝版）时经常发表李长之的文章并多有评介。根据有关材料可知，李长之在重庆时期的简历是：1938年任重庆中大助教，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兼中大讲师。1941年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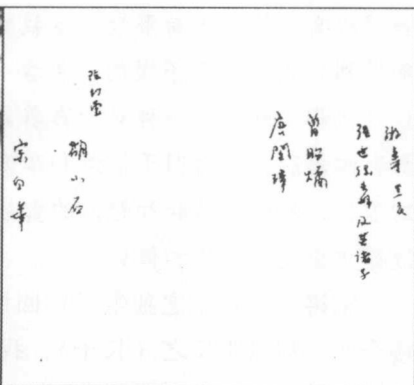


宗白华评传

大中文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概论。出版《文艺史与文艺科学》、《西洋哲学史》。1943年任中大副教授，出版《德国古典精神》。1944年主编《时与潮》文艺丛刊副刊，出版《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问题》。1945年春在重庆北碚编辑馆任编审。1946年2月代理南京编译馆图书主任。同年10月到北平师大任教。

据游寿回忆说：

西迁到了沙坪坝，各在乡间找了茅屋、牛栏住下，几个老师有一间暂住宿舍。宗先生哲学系主任已托别人，但在文学院最关键时刻，宗先生不会放过他的人物标准。当时在沙坪坝虽只是一个休息过夜的地方，但教授、主任、文学院院长，仍是有人抢去干的。有一次不知哪地有个学究乡愿，当起文学院院长。宗先生叹息说：“哲学系我左右弥缝担任多年，有人发火了，我只好辞去了（此指方东美先生）。”哲学系招生严格，每年不及几个，向来学生少于教授。有一年空白，无人被录取。可是开的课是满座的。因之在流亡中的文学院院长一职，是有些人的食指动。当时有人上书，反对地方土势力入侵。这个东西到了胡（小石）先生手上，他给宗先生看了，便着手改定几处。其实胡先生已在云大担任文学院院长，每年飞机跑着上课，另外白沙女师也有课，不能再挂空名了。然而宗先生却有“名”“器”，认为主任一职不可以委之任何人物，大有推胡先生之概。（录自游寿复笔者的亲笔信，1987年7月1日）



游寿赠邹士方照片（1940年）和照片背面她的手迹

著名美学家洪毅然回忆宗白华说：

抗日期间，他仍在重庆“中央大学”执教。我到沙坪坝他的临时住处

访他（首次见面）。那时他长住于柏溪，往返步行到校授课，生活极为艰苦。

另外，我还记得大约是在抗日后期，我还曾在重庆两路口文化教育会堂听过他一次学术讲演，可惜内容已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次讲演是由郭老用国民党当时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名义举办，并由郭老亲自主持的。那时，郭老正被国民党的“摩擦专家”们处处找麻烦，只能在进步文化界搞些诸如此类活动，而他则支持之。（录自洪毅然复笔者的信，1982年9月15日）

艾中信（原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时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回忆说：“抗战时我在中大艺术系听宗白华讲《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名作欣赏》课，讲达·芬奇的作品等，讲得很详细，但不发讲义。”（录自艾中信复笔者的信，1982年2月23日）

马骥程（原中央大学中文系学生，时为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回忆了几件事：

（一）关于《中国文学》

1942年春，汪辟疆师任中文系主任，我是系会主席（常务干事）。经师生研究，决定成立“中国文学社”，印行《中国文学》。推举汪辟疆为总编辑，胡小石、李长之、唐圭璋为编辑，马骥程为编辑兼发行人。从此，我成为“中国文学社”的全权代表，一则以我的名义向当时的内政、邮政机关申请登记；二则由我和重庆文信书局负责人王君一协商，我方负责汇集、编辑文稿，书局负责印刷、发行。前后出版5期，深受当时文教界欢迎。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顾颉刚师主编的《文史》杂志，朱自清等编印的《国文半月刊》和汪辟疆师主编的《中国文学》为学术性之三大刊物。宗白华师虽未直接参加编辑，但他和李证刚、柳翼谋、楼光来等前辈，大力赞助，无代价地供稿。

（二）关于中文系举办之学术座谈会

从1942年秋开始，中文系会举办学术座谈会，由我负责主持，先后开讲九次。每次都有详细记录。经整理先抄写为壁报，后编辑为《艺术丛话》，依次刊登在《中国文学》上。

白华师给我们主讲《歌德与浮士德》，作为壁报，曾和全校师生见面，在《中国文学》是否刊出，请查看。当时记录人是潘慈光，现在成都四川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



(三) 关于“聚珍书画展览会”

1943、1944年间，汪辟疆师将珍藏的书画多幅供我们欣赏。同学们建议举办展览会。我向辟疆师反映，大加赞同。辟疆师派我走访宗白华、胡小石、徐悲鸿、傅抱石诸师，并拟借所珍藏之书画以供展览。诸师大力支持，并或多或少的借出书画珍品。辟疆师写了《聚珍书画展览小引》一文（转载拙撰《蚕丛鸿爪》）。展览开放多日，观者如堵，颇受全校师生赞许。（汪辟疆的《聚珍书画展览小引》一文发表在1944年1月11日《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上，文中说：“民国三十三年开岁之始，中央大学中文系诸君，汇集同人所收书画，凡若干件……为聚珍书画展览会……”——笔者注）

(四) 关于《美学》和《艺术学》

《美学》、《艺术学》，主要是为哲学系高年级开讲的，而中文系、艺术系、建筑系的同学选修的不少。1944年上学期开《美学》，下学期开《艺术学》。每周三学时。主要内容，在《美学散步》一书中已谈了。在中国方面：他主要讲魏晋人风度、六朝山水诗、《世说新语》、王孟诗、《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以“充实之谓美”为主要论点。在外国方面：主要讲但丁、歌德、雪莱、拜伦等诗作。引证广博，谈笑生风，对礼俗人士，深加痛斥。（录自马骥程复笔者的信，1982年8月14日）

方绶德的一段回忆更加珍贵，他使我们对白华先生的品格有了不同寻常的认识：

1941年4、5月份，我所在的国立剧专共产党支部被破坏（我是江安县委宣传部长，那时国立剧专在此县）。我逃出来，流浪在外几个月，后来我躲在表兄宗白华重庆郊区的家里。那时他母亲——我姑母正患病（我姑母是个胖子，姑父是个瘦子），姑母叫表兄给田汉写信，说绶德也是搞戏的，你介绍给田汉找个事做。表兄并不积极写信，他对我的身份也很了然，但不说破。每天晚上他和我拿本书，到江边看晚霞，他的诗人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他去学校上课，肩背一副褡裢，前面装的各种书，背面背的是干粮和菜。我送他到江边，他在江边一边走一边说：“我每次都背这么重的东西去上课，使我想起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后过河的一幕，他身上背着婴儿，是世界的生命，很重；我也是这样，我为下一代新的生命的成长而奔走……”这充满诗意的语言使我深受感动。这样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之久。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他帮助、保护了我。在这期间他理解我，